

袁世凯与戏曲

● 唐雪莹

袁世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粹的封建时代的官僚权贵，他嗜好戏曲，尤其是京剧与河南梆子。他宠爱男旦，并娶唱髦儿戏的演员为妾。袁世凯无论寿辰、节令或其它重大的庆祝活动，均以演戏为娱。为过戏瘾，袁世凯专门设了一个“戏管家”——符殿青，专管传戏；同时，在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明争暗斗中，他也感应到了时代的气息，深知戏曲启蒙民众和宣传主张的重大社会作用。所以，袁世凯以戏曲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反对革命党人，为其政治阴谋——贿选总统、复辟帝制大造声势，锣鼓喧天的背后是一幕幕肮脏的政权交易和政治丑剧。戏曲活动伴随着袁世凯的一生，概而言之，戏曲演奏了他人生的三步曲。

第一步：狂想曲：《陈桥兵变》引出的帝王之梦。

袁世凯，字慰庭（或慰廷、慰亭），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汝南巨族”中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父袁甲三、父亲袁保中、胞叔袁保庆等先后在河南、安徽、苏北一带残酷镇压捻军和太平军起义，屠杀义军无数，是双手沾满农民革命军鲜血的刽子手。袁世凯呱呱坠地之时，恰逢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和张乐行领导的捻军与袁甲三的清军激战之时，农民军之一部因战不利而被迫撤退，袁甲三志得意满，急忙修书一封告知家中打了胜仗，正班师回朝，凯旋而归。袁保中读信完毕，望着襁褓中的新生儿，喜不自禁：“上天垂爱，叔父兄弟前线顺手，频频奏凯，我袁保中再度得子，家门有添丁之喜，真乃双喜临门……哈哈！”于是为儿子取名“就叫凯吧！但愿他将来也能鹏程万里，效乃祖凯歌频奏，平步青云，也好光我门庭，不辱祖宗。”^①诞生于杀伐农民军声中的袁世凯，果然不负其父所望，终其一生与改良、与革命、与人民为敌，这一祝愿成就了袁世凯辉煌得一生：直隶总督、军机大臣、民国总统、洪宪皇帝；也注定了袁世凯可悲的结局：国人唾骂、列强夹击、众叛亲离、魂断紫禁。

袁世凯出生以后，因其叔父袁保庆二子先后夭折，无子嗣，夫妇均对袁世凯甚为喜爱，所以袁保中便把袁世凯过继给叔父为嗣子。养父戎马倥偬，辗转于与捻军的交战，无暇顾及袁世凯。而养母牛氏对袁又过度溺爱，使袁世凯自幼就养成了纨绔子弟的恶习：娇生惯养，吃喝玩乐，放荡成性，对读书毫无兴趣，但却对戏曲“乐此不疲”。^②有一次，他家附近演戏，其母带他去看戏。当时，舞台上演唱的是

人物装束看，二人皆袒裸上体。从说唱时的道具来看，他们所持的一为皮鼓，一为小锣，这些工具至今还为乡间说鼓书艺人保存着。由他们动作表情看，既不是乐师演奏，也不是演员演唱，所从事的极可能是说唱艺术，其表演场合也应是大众化的娱乐场所，叙述语言也当以口语为主。由近代说书艺术的流传方式看，说书内容多凭艺人的记忆口耳传授，不借助文字，也能世代相传。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后来流行的一些古老的说唱底本，可以溯源到汉代说唱艺术。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艺术，对中国戏剧的成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描述，人物性格的刻划，还是人物服装的涉及，音乐、舞蹈和舞台设置等方面为戏剧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②③萧尤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46，368。

《陈桥兵变》一出戏。年幼但聪明的袁世凯注意到许多的兵卒，把一件黄袍披在一个红脸大汉身上，就悄悄地问母亲：“这个红脸大汉是什么人？”其母答曰：“赵匡胤。”袁不依不饶的接着问道：“赵匡胤是什么人？”刘氏解释道：“赵匡胤是周朝的将领，这时众将领正在拥戴他做皇帝，代周而有天下。”袁听后，默然，似有所悟。演戏结束，袁世凯回到家中，立即招来家中的佣人，模仿戏中所演的样子命他们取出一件衣服，披在自己身上，并学赵匡胤的一举一动，迈着方步，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众人皆笑之不止。可见其儿时做皇帝的梦想即是从此戏中所得，戏曲给了袁世凯以后的政治之旅、仕宦之途以启蒙和航标的作用。

1866年，袁保庆因围剿捻军有功，被清政府授以山东知府。袁世凯随养父来到了济南。这是袁世凯平生第一次走出闭塞、落后的乡村，这座陌生的城市为袁世凯的生活打开了另一番天地。袁保庆虽然征战疆场，功名自马上得，但他仍然希望养子将来能走读书入仕一途，所以到了济南，袁保庆为袁世凯聘请了第一位启蒙老师——清朝举人王志清。王是一位能文、博通的鸿学硕儒，他与袁保庆有多年的交情，再加上他对顽劣有加但又天资颖悟的袁世凯钟爱，所以平时授课极为用心，辛勤培育，督导有力。无奈袁世凯野性难驯，逃课成了他的固有项目。逃课出来的袁世凯最爱光顾的地方莫过于济南大大小小的剧院戏场，只有在那里，桀骜不驯的他才

27.

④转引自姚珍明，从人虎相斗艺术开始——汉代“百戏”与中国最早的剧目《东海黄公》[J]，《东方艺术》，1995. 6。

⑤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4。

⑦钱志熙，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 [J]，《文学遗产》，1992，(5)。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可以静下心来，聆听每一出戏。戏曲成了静心剂，使袁世凯浮躁的天性暂时得以休眠。在众多的戏曲演出剧目中，袁世凯独对那些宣扬忠臣孝子的剧目神往，每观至感人之处，居然痛哭流涕。这种经历和心得在他以后编练新军时被用以训导北洋军，作为灌输北洋军的主导思想。所以后来的北洋军名义上虽是朝廷的臣子，实际上却是袁世凯的亲信和家奴，对于他们来说，“只知袁官保，不知清王朝。”

第二步：野心曲：《杨翠喜》铺就的仕宦之路。

戏曲助成了袁世凯的飞黄腾达，这就是民国时期一时被传的沸沸扬扬的杨翠喜案。

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陆军的惨败和水师的全军覆没，彻底暴露了清政府旧式军队的软弱无能。改革旧军队，编练新军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急迫任务，一向崇拜“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方面上书当朝权贵，大讲改革兵制，采用西式练兵之法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四处奔波，八方钻营，凡是与之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人物他基本上打点到了：兵部尚书荣禄，庆亲王奕耶，军机大臣李鸿章，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连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等。袁世凯的苦心钻营很快有了回应，各亲王、军机大臣被袁世凯点中了要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们联名上奏，力保袁督练新军：“……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晚畅戎机，前往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倘革，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⑤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掌握了督练新军的大权。当然，飞黄腾达后的袁世凯为以后大计着想，还不能过河拆桥，他对庆亲王父子的巴结尤为用心，除了官场上惯用的金钱结交外，“其绝古今，为诸奸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又以女色羁縻之，导演了近代史上的杨翠喜案。

清中叶以后，由于慈禧的倡行，上行下效，官僚贵族嗜戏成风，人际往来，无论场内场外，均已观戏做为必备节目之一，尤其清末民初，此风日炽。这里面有真正懂戏，倾心于此者。当然也不乏一些鱼目混珠、附庸风雅之流，混迹其中，专以品评、渔猎女色为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袁世凯从小留恋其中，更是深谙此中三昧。

杨翠喜，河北梆子早期著名的女伶，天津人。十二岁被卖于芦台，后又被转卖天津的杨某，因之改名为杨翠喜。此时正是女伶风靡，许多妓院的老鸨为了增加姑娘们的身价，使手中的摇钱树更加枝丰叶茂，纷纷聘请教戏师傅，杨翠喜也被送到了天仙戏园学唱河北梆子。她天姿国色，聪颖机敏，唱腔悠扬婉转，韵味十足，表情细腻逼真，擅长演《拾玉镯》、《喜荣归》、《珍珠衫》、《错中错》、《卖胭脂》、《打樱桃》等剧目。李叔同曾对她在艺术上多有帮助。天津许多的豪商富贾慕其色艺双全，却苦于无缘结识。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也是杨翠喜的捧场者之一，为了拉拢住奕耶，袁在奕耶之子载振去天津公干之机，大摆宴席之后，挑选天津所有名伶演戏，杨翠喜自然在特邀之内。当杨出场时，载振目为之盯，神为之凝。他的这一特殊举动，岂能逃出袁的犀利眼睛。袁心领神会，在剧终后，通过杨以德的牵线搭桥，加以威胁利诱，终于以十万元赠金的名义，把杨翠喜送进了载振的行馆。亲手经办此事的段芝贵也被提升为黑龙江巡抚。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很快被传的沸沸扬扬，御史赵启霖上折参奏，清廷派载津、孙宝琦同赴天津会查。而孙是奕耶一手提拔的，当然知道如何去对付。于是到了天津之后，他听从袁世凯的谋划，指使杨以德把杨翠喜送给天津盐商王宜孙作妾，并制造伪证。结果昏庸的清廷却以侮蔑亲贵罪把赵启霖降职使用。舆论一片哗然，全体都察院御史联合会奏，清廷迫于压力，只得免去了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抚之职，而此案的主谋——袁世凯却毫发未损，载振感其恩德，与之结拜为盟兄弟。民国初年，有人根据杨翠喜事实，编演了剧名为《杨翠喜》的时装新戏，因此杨翠喜成为一时新闻人物。^⑥一代名伶杨翠喜，却因此早早的脱离了舞台生涯，艺术生命由此断送。

树大招风，权大招忌。冒险、精明一如袁世凯者，最终仍未躲得过被参遣回原籍的悲剧。彭德注上村“隐居”的袁世凯，表面看来似乎已参破红尘，甘为隐士，

怡然于世外桃源之乐。

诗酒唱和之余，袁世凯乐此不疲的仍是观戏。他时常把河南坠子和山东梆子戏的艺人叫到家中演唱，这些地方戏曲多是自娱自乐的。逢到年时节令、生日寿辰，则有戏管家符殿青传北京京剧界的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惠芳、杨小朵、德如等来唱“堂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无论袁得势还是失势，雷打不动。光绪二十九年，京剧演员谭鑫培、王瑶卿、王惠芳、杨小朵等在安阳的袁宅演唱。^⑦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五十大寿所举办的一次堂会，相当隆重。那桐亲自担任袁家堂会的“戏提调”，北京的名角全体出演，而且谭鑫培破例演了双出。为了谭鑫培的双出，那桐不惜屈尊相邀。原来，那天那桐到谭家提出此项算是“过分”的要求，因为谭鑫培与那桐平日较熟，所以谭鑫培半开玩笑地说：“中堂（那桐当时任尚书）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他的话一出口，那桐的安已请下去了。谭鑫培连忙说：“我是开玩笑，您怎么认真起来？凭您的面子，吩咐我演双出，哪有不演之理？”那桐当时和袁世凯同是尚书，而为袁世凯祝寿演剧，肯向谭鑫培卑躬，可见袁世凯之权倾朝野。^⑧一直到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节令戏仍是照演不误，据袁的爱女袁静雪回忆，袁世凯“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⑨春节过后，副总统黎元洪及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太太们，先后到中南海给袁世凯拜年，这时仍由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唱“堂会”戏。袁世凯最爱点一出闹剧中的《浣花溪》，而其姨太太则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因袁世凯在兄弟行排行老四，又有和戏中老爷类似的癖好，所以，每演到此戏时，观看的人心知肚明，均窃笑不已。袁世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在听“堂会”戏时也表露无疑，为了严“男女之大防”，除了正夫人，女眷们都在麻檐底下坐着，而且他还叫人在麻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竹帘子。所以，其爱女袁静雪认为“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民国前后，由于戏曲改良运动的影响，戏曲的启蒙、宣传社会作用被大大

强化，成为各党派用以启蒙民众、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嗜戏成癖的袁世凯当然也不会放过借重戏曲反对革命党人，成就其政治阴谋。但赏戏可以，写戏侮蔑革命党远非袁世凯所能，于是他利用手中权势开始拉拢戏剧界的编剧。具有“东方莎士比亚”美称的罗瘿公即是被他极力拉拢的人。罗瘿公，曾短期担任过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等职。但其最主要的成就则是京剧编剧，为程砚秋编创大量的剧本，为程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袁世凯想借罗瘿公编剧之才，为自己出力，于是以故交之谊，高薪聘请。而罗瘿公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断然拒绝。后来袁世凯左搜右罗，终于觅到一个无名编剧，按照其旨令编写了一部《孽镜台》，在戏文中把孙中山、黄兴、秋瑾等革命先驱说成是“善类”，而用以征服这些“善类”的“金刚”则为段祺瑞、张勋、冯国璋等人。编写完毕，袁世凯马上下令命当时一些著名的京剧演员进行演出，杨小楼饰冯国璋，钱金福饰张勋，金仲仁饰段祺瑞，姚佩文饰孙文，慈禧全饰黄兴，姚佩兰饰秋瑾。但只是在内部演出了一次，成为最短命的剧本。

第三步：断魂曲：宠男旦带来的人生哀歌。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行为早已引起了一些有良知的戏曲艺人的不满，他们利用为袁世凯演戏的机会，或巧妙讽刺，或当面驳斥，使其皇帝的威风扫地，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而最终给他致命一击的还是他宠爱多年的豫剧男旦的叛变。

爬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袁世凯的私欲仍未得到满足。他强奸民意，终于如愿以偿，做了中华帝国的皇帝。为了以示庆贺，在袁生日这一天，一些媚袁的无聊政客编写了一出京剧《新安天会》，这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奉旨编成，讲述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逃回水帘洞的故事。剧中孙悟空自号“天运大圣，仙府逸人”，八字须，胡角还向上翘着，使人一看便知是讽喻孙中山先生的，“天运大圣，仙府逸人”便含有孙中山先生的字：逸仙。其中军官自称“黄风大王”，肥头大耳，步履蹒跚，影射革命党人黄兴。在袁世凯生日那天，袁在居仁堂大摆庆宴，并用武力挟持谭鑫培前往，要他主演此剧，谭鑫培坚决拒绝，演了一出《秦琼卖马》以讽之。不久，在一次堂会上，又把孙菊仙拘来，迫令他演此剧，也遭到拒绝，换演了一出别的戏。孙菊仙在回家的路上，想着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气不打一出来，随手把赏给他的二百块银洋（铸有袁世凯的头像）撒在地上，并大声说：“袁头银洋落地了。”诅咒袁世凯早日倒台，一泄胸中之愤。^④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位有骨气的艺人以外，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她就是著名的坤伶、河北梆子演员刘喜奎。她与杨翠喜同为河北梆子的早期著名女演员，齐名剧坛。有一次被请到袁府唱堂会，当时袁世凯住在中南海，刘正准备化妆时，一个听差传刘喜奎说，袁世凯让她到总统府大厅去。刘有备而来，壮胆直奔总统府大厅，她发现肥头大耳的袁世凯正与手下的“大臣”和众姨太太打牌，刘直奔袁世凯跟前大声质问：“你叫我有什么事？”袁本来是想让刘陪他打牌，被刘这么一声大叫，惊得他目瞪口呆。在袁世凯的面前，从没有人敢如此冒大不敬对他讲话，所以面对刘的咄咄逼问，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旁边的听差急忙上前说道：“陛下，这就是刘喜奎小姐。”袁世凯经听差一提醒，马上把眼睛一瞪，“啊”了一声。他原想仔细看看大胆犯上的刘喜奎究竟长的如何，可一抬眼，正碰上刘正义凛然、两眼喷火的怒目，只好摆摆手说：“没什么事。”刘喜奎怒气冲冲地说：“没有事叫我干什么！”说罢，扬长而去，留下一群不知所措的家伙在那儿发愣。最后，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袁世凯自我解嘲地嘟囔：“这戏子真难斗。”袁世凯在刘喜奎面前碰了钉子，失了尊严，无心再看戏，他手下的人乖乖的把刘喜奎送走了。

在当时的社会，“宠男旦”之风大盛，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袁世凯也有此好。1873年袁保庆得霍乱死于南京，他陪同养母牛氏扶柩回到了河南项城的老家。已经习惯了都市里的灯红酒绿、秦楼楚馆、宴饮交欢，偏僻而落后的故乡对于袁世凯那颗不安分的心来说再也无法适应。他继续着吃喝玩乐的日子，出入戏院歌楼。袁世凯常去戏院听豫剧班的演出，戏班中有一个叫唐天喜的，也是河南人，人生的极为标致俊美，其扮演的小旦更是风流十足、惹人怜爱。袁深深陶醉其中，不知不觉的爱上了他。为了达到独占的目的，袁与豫剧班交涉，最终唐天喜脱

籍戏班，成为他的贴身男仆，在以后的岁月里，随他走南闯北，形影不离，并伴着袁世凯仕途的升迁而扶摇直上，平步青云。袁在公事之余，常令其唱曲消遣，可谓唐的贴心“追星族”。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一般人认为他是“启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⑤其实唐天喜的叛变对他更是致命的一击，无异于对垂危的袁世凯下了一道催命符。洪宪帝制发生后，各地护国军起而讨伐之，袁在唐天喜的主动请缨下，委任他为援湘副司令，谁知唐是一嘴财如命之徒，其所率领的队伍刚一开进湖南，就被湖南的赵恒惕花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袁世凯接到唐天喜叛变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大受刺激，病情加重，他在临死之前，精神错乱的唠叨不止：“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对权力的崇拜与贪欲使袁世凯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对权力的崇拜与贪欲又使他众叛亲离，为自己掘好了坟墓。83天的皇帝梦不啻是一幕讽刺短剧，只是一向爱看别人演戏的袁世凯却成了讽刺短剧的主角。

注释：

^①杨树标、王国永：《袁世凯家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②李松林、王树荫：《民国历届总统》，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③《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原奏》，《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第19页。

^④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天津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⑤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河南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⑥李泰棻：《杨翠喜案及其他》，引《魏斯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吴长翼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302页。

^⑦袁静雷：《我的父亲袁世凯》，引《魏斯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吴长翼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⑧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下），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1008页。

^⑨李松林、王树荫：《民国历届总统》，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